

## 清代才学小说三论

苗 怀 明\*

<目 次>

- |                |              |
|----------------|--------------|
| I. 作为小说流派的两个难题 | III. 可贵的创作尝试 |
| II. 炫学背后的潜在动机  |              |

### I. 作为小说流派的两个难题

所谓才学小说之名是根据鲁迅的相关论述归纳而来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专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一篇，以《野叟曝言》、《镜花缘》、《蟬史》、《燕山外史》四部作品为典型，指出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以小说见才学者”。有些学者据此将才学小说作为一个与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公案小说等并列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流派来看待<sup>1)</sup>，因为这些小说作品都出现在清代，故此又称作清代才学小说。有的研究者则将这类小说称作杂家小说<sup>2)</sup>。叫法不同，大致的意思则差不多。不过，在将这些小说作品单独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来进行深入研究时，会遇到两个让人为难的问题：

首先，作品数量太少，只有区区四部，即《野叟曝言》、《镜花缘》、

\* 东国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教授。

- 1) 有些研究者不称小说流派而称小说类型以与流派之称形成区别本文采取通常的说法。
- 2) 参见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载其《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蟬史》、《燕山外史》。作为一个小说流派，除了作者具有共同或近似的创作理念、作品文本形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共性特征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作品数量，形成应有的规模和影响。虽然划分小说流派不能完全以作品的数量多少为依据，但它却是一个判断流派能够成立及影响的重要参照。尽管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文学中的流派不同，更多通过题材体现出创作上的共性，作者之间缺少沟通。但既然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来看，代表着小说创作的一个方向或一种范式，如果作品数量太少的话，只能说是个别现象，难以称之为流派了。反观其他小说流派，大多有几十部甚至上百部作品，且其创作持续的时间较长，有不少如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等跨越明清两代。将才学小说与其放在一起，不仅分类标准不同，而且作品数量也不成比例。

其次，被称作才学小说的四部小说之间差别太大，难以成为一个小说流派。只要将才学小说与其他小说流派如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进行对照，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等小说虽然所写朝代、人物、情节不同，但在题材选择、创作手法、作品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很多明显的共性，这种共性即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流派特征。但在才学小说的四部作品中，这种可称之为流派特征的共性实在太少了。

大体说来，通常所称的四部才学小说是由两类作品组成的，其中《野叟曝言》、《镜花缘》算一类，《蟬史》、《燕山外史》则属于另一类，两者之间差别甚大。前者为炫学之作，即鲁迅所说的“以小说为度学问文章之具”；后者则为逞才之作，即鲁迅所说的“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sup>3)</sup>。将这两类差别甚大的小说归到一个小说流派中，会出现如下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一，炫学与逞才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两者对作者自身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学者之作，后者是才子

---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11、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之作,学者和才子是学养、气质差别甚大的两种类型的文人,两类人笔下的小说作品自然风格迥异,这一点很容易明白,不再赘述。

其二,两者在作品中的反映及具体体现也很不相同。前者体现的是学问的渊博和精深,后者体现的则是过人的才华和鲜明的个性,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过去人们习惯于笼统地将才、学二字放在一起,但忽略了才和学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很明显的,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三,前两部作品《野叟曝言》、《镜花缘》为白话通俗小说,后两部作品《蟬史》、《燕山外史》为文言小说,两类小说在文本形态及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就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分类的惯例而言,通常是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分开的,除了才学小说外,很少将两大语言系统的作品混在一起进行分类的。将如此差异甚大的作品算作一个流派的,只有才学小说。对小说分类而言,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但不管哪一种,都得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分类标准,才学小说的分类是着眼于创作手法,按照这种分类方法,无法对其他小说进行很好的分类,它与通常按照题材分类的方式存在着抵牾。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吹毛求疵,故作新论,而是为了研究的准确和科学。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在实际工作中,已经遇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法。以张俊师的《清代小说史》一书为例,该书在纵的方向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在横的方向上则是按照小说流派来叙述。对于通常所说的四部才学小说,该书一方面将其作为一个小说流派,一方面则又分别进行处理:将《野叟曝言》作为儿女英雄小说,将《蟬史》、《燕山外史》放在文言长篇小说中,《镜花缘》则作为杂家小说<sup>4)</sup>。这样做一方面考虑到四部小说“以小说见才学者”的共性,同时又顾及各部小说之间的较大差异,算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但这样以来,典型的才学小说或才学小说就只剩一种了,这样一来,才学小说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合理性更加不足了。此外,也有研究者将《镜花缘》称作科学小说<sup>5)</sup>、

4) 参见张俊《清代小说史》第五章《清代中期小说》(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讽刺小说<sup>6)</sup>，等等。

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两个为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四部才学小说与其说是一个小说流派，不如说是体现了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一个在清代中期出现的新的创作倾向。事实上在这四部才学小说创作的前后，其他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炫学逞才倾向，比如《女仙外史》，论者称其“荒唐怪诞，而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sup>7)</sup>。只不过这四部小说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他小说不是十分明显而已。

如果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进行考察，将四部作品称作才学小说，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小说流派，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尴尬情况。已有研究者在做这样，比如刘勇强在其《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明确指出：“从小说类型的角度说，这些小说其实比较模糊，有的具有历史小说的特点，有的则带有神怪小说的内容；大多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有的却用文言写成。”<sup>8)</sup>他将才学小说作为与小说创作思想化并列的、体现“清中叶小说创作文人化的一个重要趋势”进行论述，笔者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是比较妥当的。

## II. 炫学背后的潜在动机

炫学、逞才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中早已有之，并不是到清代才出现，鲁迅在谈到汉魏六朝小说时，曾提及当时文人创作的动机：“文人好逞狡狴，或欲夸示异书。”<sup>9)</sup>无论是“逞狡狴”还是“夸示异书”，都有炫学、逞

5) 这一叫法主要见于晚清时期，如定一云《小说丛话》：“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载《新小说》第15号(1905年)。

6) 比如金鑫荣称其为“奇幻寓言类讽刺小说”，参见其《明清讽刺小说研究》第六章《奇幻寓言类讽刺小说》，凤凰出版社 2007年版。

7)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 2005年版。

8)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4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才的成分在。在唐代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张鷟的《游仙窟》就体现得较为明显。其后的小说创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比如明代的文言传奇小说等。这些现象大多体现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相比之下,白话小说出现这一现象在时间上要晚得多,这与其源于民间、形态粗朴有关。到了明代后期,随着白话小说发展的文人化和精致化,开始出现炫学、逞才的现象,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较为明显。到了清代中叶,则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现象,出现了通常所说的才学小说。

就白话小说而言,逞才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就已出现,相对而言,炫学则是到清代中叶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此前的白话小说中较少见到。这里对清代中叶白话小说中的炫学现象稍做探讨。

小说创作显示的是作者多方面的文学才华,正如古人所说的:“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sup>10)</sup>因而逞才是很容易理解的。按说文学创作与学问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何以作者要在小说中借助人物之口大谈学问?从《野叟曝言》、《镜花缘》等作品的内容来看,作者是有意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结合此类作品作者的身份经历、思想理念以及实际的创作情况来看,驱使作者如此做的动机至少有如下三个:

一是作品表达的需要。这是最为直接的、表层的原因。无论是《野叟曝言》中的主人公文素臣还是《镜花缘》里的众才女,尽管他们性别、身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其中文素臣“十岁即工诗古,涉猎史子百家。十八岁游庠,后益事博览,精通数学,兼及岐黄、历算、韬略诸书”<sup>11)</sup>,众才女同样博见多闻,学识不让须眉。因此,要表现他们的生活,势必会写到他们学问的一面。而描写文人生活,表达文人情趣,这正是清代白话小说创作的一个趋势,通常称之为文人化。

有关文人论学的描写并不只是出现在《野叟曝言》、《镜花缘》这两

10)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第八,中华书局 1996年版。

11) 《野叟曝言》第一回《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部小说中，比如创作于同一时期的《红楼梦》里就有不少谈文论艺方面的描写，比如林黛玉和香菱的论诗、薛宝钗与惜春等人的论画、张友士的讲究病理，等等。只不过这些描写和作品中的故事、人物有机地融为一体，没有《野叟曝言》、《镜花缘》这些作品那么刻意强化，过于突出、明显而已。

二是体现人生价值的需要。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文人的生活道路变得十分狭窄，金榜题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上这条道路。无论是夏敬渠还是李汝珍，尽管他们都颇有才华和学问，如夏敬渠“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sup>12)</sup>，李汝珍则“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sup>13)</sup>。但科举的失利使他们终生都无法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上不能立德，中不能立功，即便是立言，也并不顺利，因为他们人微言轻，著述得不到重视，限于财力，也难以得到刊行的机会。

对夏敬渠、李汝珍等人来说，科举的失利使他们注定无法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要想体现人生的价值，只能选择其他方式。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白话小说。夏敬渠曾和朋友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sup>14)</sup>话说得很明白，尽管自己“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但并不甘心，还是想像那些“得志行道诸公”一样，“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

在小说作品中，他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做了一场白日梦，不管是幻想

12) 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文苑传载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599页，齐鲁书社 1990年。

13) 余集《李氏音鉴序》，载张菊玲编《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第178页，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 1980年刊行。

14) 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的人物文素臣，还是才艺双全的才女们，都不是现实生活中所能出现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借助作品主要人物之口大谈学问，既是为了使带有理想色彩的故事人物更加高大，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博学多识。炫学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手段，利用这种手段，个人价值可以部分地得以体现，最起码作者心里是有这样的期待的。

三是保存个人的学术见解。夏敬渠、李汝珍都著有诗文集及多部学术著作，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诗文或较为得意的学术见解写进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夏敬渠的多部著作如《经史余论》、《全史约论》、《浣玉轩诗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都或多或少地被《野叟曝言》一书收录或摘引<sup>15)</sup>。李汝珍也将其《李氏音鉴》、《受子谱》等书中的不少心得、见解写进了小说《镜花缘》中。可见除了前面所说的两点之外，夏敬渠、李汝珍创作小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那就是借助极为流行的通俗小说，将个人精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尽可能保存下来，达到传世的目的。这样即便个人的学术著作得不到刊布的机会流传不广乃至失传，自己的学术见解还能部分地保存下来。作者显然是有这样的用意在，这正如王琼玲所言：“夏敬渠创作《野叟曝言》的目的之一，即是以小说存录其未能刊刻的作品内容。”<sup>16)</sup>

当然，这也是一种较为冒险的保存著述的方式，学术著作很难得到刊刻的机会，篇幅更巨、耗资更多的小说也并不见得容易被刊刻。

此外，炫学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写作习惯的一种自然表达。夏敬渠、李汝珍都是术有专攻的学人，其兴趣也在此，在创作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习惯和爱好。还有研究者提出，清代中叶出现的利用小说炫学的现象与当时的学术文化氛围有关，这也是有道理的，因前人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

15) 具体情况参见王琼玲《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第五章《夏敬渠生平、著作与〈野叟曝言〉考论》，台湾学生书局 2005年版。

16) 王琼玲《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第368页，台湾学生书局 2005年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带有炫学色彩的小说作品商业色彩较淡，大多为作者有感而发，非牟利而作。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基本不受书坊主和读者的约束，所表达的是个人色彩较为鲜明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们的炫学之举完全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在探讨此类现象时，应多从他们自身的境况入手。

### III. 可贵的创作尝试

炫学式的创作就文学层面而言，应该说一个得不偿失的尝试，弊大于利，这样做固然可以增加小说自身的学术文化内涵，但长篇大论、游离于故事之外的炫学大大削弱了小说的可读性，效果则适得其反。对此，现代学者多有批评，比如鲁迅批评《野叟曝言》“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批评《镜花缘》“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sup>17)</sup>。

不过，如果将炫学现象放在整个中国小说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来看，这种创作尝试本身也许是失败的，但其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内涵和意义，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它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阶层对小说态度的潜在变化，这是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前文已经说过，带有炫学色彩的作品大都为有感而发，“抒写愤懑，寄托深远，诚不得志于时者之言”<sup>18)</sup>。作者通过小说创作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以文学形式来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此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尽管学界对夏敬渠才创作《野叟曝言》的时间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洋洋一百五十四回的百万字大书，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李汝珍创作《镜花缘》，也是“以数年之力成之”<sup>19)</sup>，这些作品可谓作者一生心血所系。

17) 以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13、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18) 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9) 许乔林《镜花缘序》，载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599页，齐鲁书社



但问题在于,花费大量心血,抒写如此庄重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选择白话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要知道,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在古代一直为主流文化所排斥。此前,顺治、康熙、雍正等皇帝都曾下过查禁小说的诏令,并载之律例<sup>20)</sup>。作者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既然了解,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被称作淫词邪说的白话小说,为什么不采取其他更容易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方式?这样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创作,因为在清代,这已经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

夏敬渠、李汝珍的选择显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白话小说独特的魅力和功能对他们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放弃别的文艺表达形式,顶着压力,花费大量心血进行小说创作。之所以说顶着压力,是因为创作小说在当时是不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者,作者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现实的利益,比如稿酬或名声等。

那么,是小说的哪些特点对夏敬渠、李汝珍们形成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白话小说的普及性。

与诗文乃至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所拥有的读者群要大得多,它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其传播的广泛及影响的深远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它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歧视,但其影响力并没有因之减弱。只要看一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作品在明清两代的流传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白话小说普及性的特点对那些怀才不遇的下层文人们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不能借助体制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可以通过白话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才华,了解自己的学问,这不也可以做到流芳千古吗?尽管形式在当时显得另类了一些。

---

1990年版。

20) 参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相关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二是白话小说文体的魅力。

宋元以降，经过数代文人的参与和改造，白话小说已经发展成熟，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文体，既可叙述、抒情，也可议论，篇幅长短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真正做到了文备众体，其所具有的文体优势是其他文学样式无法取代和比拟的。这样，文人在诗、文之外又多了一种创作的选择，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再者，从明末开始，随着文人阶层对白话小说的深度参与，白话小说的创作出现分化，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继续沿着民间化、通俗化的方向演进，一个则是朝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所谓的文人化的方向，就是作品开始越来越多的写文人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流露出文人的情趣，作品逐渐向精致化的方向发展。白话小说创作的分化自然也会引起读者群的分化，对像《儒林外史》这样的小说，显然对文人阶层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引起共鸣。

白话小说文体自身的艺术魅力和越来越多文人的参与，对夏敬渠、李汝珍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使他们乐于使用这一具有活力的文学样式，以创作白话小说的方式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这也可以解释，何以炫学式的白话小说只能出现在清代，而不是在宋元明时期？这是小说自身发展演进与外界各种文化因素互动的结果。

宋元时期，白话小说虽然在民间蓬勃发展，但其形态粗朴，对文人没有多少吸引力，尽管有一些下层文人以书会才人的身份参与创作，但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那就是谋生。他们的创作完全受市场控制，作品中看不出个人的东西。到明代特别是中后期，随着白话小说的再度繁荣，一些优秀作品引起了部分开明文人的关注，他们以评点、品赏等形式表达对这类新生文学样式的喜爱，有些人如冯梦龙、凌濛初等人还亲自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动机除了商业利益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教化，从其作品中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尽管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一些见解，但他们还不愿意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体现个人的价值。

进入清代之后,文人的参与更加深入,白话小说朝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就创作动机而言,不少人创作小说既不是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是为了教化宣传,而是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展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到了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对文人特别是那些怀才不遇的下层文人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是文人对通俗小说态度逐渐变化的结果。如果他们对白话小说反感,根本看不起白话小说的话,根本就不会选择这种文学形式进行创作,更不用说借助这种文体来炫学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夏敬渠、李汝珍等人进行小说创作、炫学逞才的同时或稍后,一些学者也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他们对白话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学的浓厚兴趣和重视态度,一些学者在笔记中对小说的作者、本事等问题进行考索。比如梁章钜的《浪迹续谈》、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俞樾的《茶香室丛钞》、《春在堂随笔》、平步青的《霞外摺屑》,等等。这并非个别现象,尽管这种考索工作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但它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对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态度的微妙变化,很值得注意。

在作品中大篇幅地谈文论艺,尽管有喋喋不休、喧宾夺主之嫌,但对白话小说来说,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夏敬渠、李汝珍这些具有学者身份的文人愿意创作白话小说,在作品中谈文论艺,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勇气的举动,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小说的学术文化品位,改变人们对白话小说淫词邪说、鄙俗浅陋的负面形象,应该说这对小说的发展还是有益的。对其正面意义,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再者,在作品中炫学,这也是一种可贵的尝试,通过这种尝试,后世的作者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文体的小说可以容纳哪些东西,容纳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教训,也是一笔可贵的文学财富,它让人们看到此路不通,不必为此耗费心力。何况《野叟曝言》、《镜花缘》这些小说内容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并非炫学二字所能概括。

有趣的是,炫学式的小说创作方式主要集中在清代中期,其后就甚为罕见了,可见效仿者并不多,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有限。何以如此?

当然主要还是文学方面的原因。毕竟小说是文学，以才情而不是不以学术见长。作者写得很卖力，读者却未必买账。对书坊主来说，读者一旦不买账，这种炫学的创作范式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不会很高。缺少来自市场的驱动，作品就难以刊刻流传，作者的创作兴趣自然也就逐渐淡下去。

但不管怎样，这种炫学式的小说创作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次可贵的创作尝试，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可见世态人心及中国小说内在的演变轨迹。因此，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何满子，《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金鑫荣，《明清讽刺小说研究》，凤凰出版社，2007。  
刘廷玑，《在园杂志》，中华书局，2005。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  
夏敬渠，《野叟曝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  
张菊玲编，《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0。  
王琼玲，《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学生书局，2005。  
王利器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Abstract>

The name of CAIXUE novel is based on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on Lu Xun's.

However, if it as a literary genre, will face two problems, The Four CAIXUE stories which people usually talk about are not a literary genre, they are the creation of a new trend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To talk about academic research is an emerging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Its motives are at least three: first, to express needs; secon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the third,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individual academic opinion, It reflects that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on the novel attitude changes, This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ernacular fiction, Novels to show off the academic approach is a valuable creative attemp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Key words : The CAIXUE novel ; Show off the academic ; History of the novel

